

# 整理工作本身也是研究工作

## ——陆林教授辑校整理的《金圣叹全集》评述

张小芳

“整理工作本身也是研究工作”，是黄松先生在总结过去三十年古籍整理出版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形成的有关今后工作的普遍理念和重要原则<sup>①</sup>。其中包含的由专门研究完善古籍整理、由古籍整理深化专门研究的内涵，对整理者的研究意识和整理本的学术含量提出了高度要求。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末出版的由陆林先生辑校整理的《金圣叹全集》，在前言和附录的撰写选编、文本辑校，甚至编排体例上，均可见出专门研究与古籍整理的互动效应，庶几可以作为黄松先生此语的现实注脚。整理者陆林先生是金圣叹史实研究专家，其坚持“从原始文献入手，运用实证与阐释相结合的方法”，考察金圣叹“生存状态、人际关系、创作实绩以及相关的基本史实”（《全集》后记第2页）的学术理路，不仅在史实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并由史实研究进而开拓了金圣叹文学理论研究的视域。而这种专门和深入的研究，作为全集整理的学养底座，也成就了《金圣叹全集》作为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础上的整理之作的鲜明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走在金圣叹研究前沿的前言

古籍整理本前言之撰作，有面面俱到的介绍式、引导式前言，也有如季羨林先生为《大唐西域记校注》所撰前言，本身就是“公认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见黄松文）。《金圣叹全集》的前言无疑应归入后一类。前言以金圣叹人生轨迹的勾勒、性情人格的品鉴和批评特色的揭示为线索构架全篇，其实是整理者本人长期以来研究成果的集中和浓缩。

①黄松《快速发展，成绩显著——古籍整理出版三十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

收稿日期：2009-12-16

作者简介：张小芳（1974-），女，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和文论研究。

其征引材料之丰厚和事件复现之精准自不待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金圣叹扶乩降神宗教活动的揭示和分析，更是具有改写金圣叹文学批评研究史的意义。相关文献史料的发现和完备，不仅补充了金圣叹史实研究中对早期活动语焉不详的缺憾，使我们对这位批评大师、文坛怪杰三十岁之前的生存状态有了具体的了解，而且带来了金圣叹文学批评研究的突破，启发了新的研究增长点。

所谓突破，是指作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降神活动及由此被妖魔化的舆论处境，积淀成为人生“底色”后，内在决定了金圣叹文学批评“昭雪辱者”的选题和标新立异的心态。而在长期降神活动中运用的设身处地、揣摩人心的手段，在文学批评中则转化为心理分析方法，成为其“一副手眼”说的重要理论内涵；同时指出，正是这种长于心理分析的论述特色，使得古代文学批评从片言只语的点评，发展为容量适当的阐释，由内容的需要导致了形式的突破。作者的这些认识，以典型翔实的史料为支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目前文学本位的纯理论研究存在的重复和停滞局面，充实和丰富了从时代特征、哲学思潮和学术背景角度解释金圣叹批评特色的宽泛化结论，体现出较高的理论创新度和阐释深度。

所谓研究增长点，是指由降乩活动史料的揭示，彰显出金圣叹文学创作的才华，使其价值论证从文学批评领域拓展到文学史领域成为可能，从而启发了学界的研究意识。如陆林先生曾首先考证指出“泐庵大师”即金圣叹，及其在扶乩活动中虚构的无叶堂和塑造的叶小鸾形象，对《红楼梦》创作可能具有的启迪作用<sup>②</sup>。而杜桂萍先生和陈洪先生也在金圣叹降乩活动的相关史实披露的基础上，分别撰文《诗性建构与文学想象的达成——论叶小鸾形象生

②陆林《〈午梦堂集〉中“泐大师”其人——金圣叹与晚明吴江叶氏交游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活动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7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成演变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和《揣摩和体验——金圣叹奇异的异性写作论析》（《南开学报》，2009年第4期），揭示其文学史意义，二人角度不同，但均将金圣叹降乩叶绍袁家相关史料作为立论的核心材料。特别是陈洪先生，其在1993年即已撰文对金圣叹的降乩活动加以关注<sup>①</sup>。如将其与发表于16年之后的文章进行比较，不难发现研究重心的转移和阐述角度的变换，而这种转换，倘若没有对“泐庵大师”即金圣叹及其在吴江叶家降乩行为的全面揭示为前提，是很难发生的。因此可以说，《全集》前言的前沿性，体现为结论和方法的双重启示，嘉惠学界不少。

这篇前言以《才名千古不埋论：金圣叹精神风貌和批评心路简论》为题发表后（《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有关内容很快被介绍<sup>②</sup>，亦显示出学界对其学术创新的关注和认同。

## 二、专门研究和整理原则互动的文本辑校和编排

全集的文本辑校编排，也体现出专门研究对古籍整理的辅助和完善作用。

首先，就辑佚而言，对金圣叹一生著作穷尽收集，是“全集”题中应有之义。如篇幅较大的《小题才子文》的补入，即是此全集资料价值的表现之一。整理本增加的诗文辑佚部分，使“全集”更加名副其实。而辑录本身应可视作整理者“综合运用谱牒、尺牍、笔记、别集等多种史料”，通过考订而“揭示圣叹的精神生活状态”的结果<sup>③</sup>。其中除了为降乩活动中圣叹化身泐庵大师作品著作权还归圣叹所得的诗文外，还有从郡邑总集《百城烟水》和圣叹挚友徐增的别集《九诰堂集》中辑录所得。至于从圣叹书法手迹及画作题跋辑录的佚文佚诗，不仅是将金圣叹史实研究边界从文学扩充到书画领域之后的创获，也印证了金圣叹在“书画艺术上亦颇有才能”（《全集》前言第8页）之可信。对金圣叹这样一个身遭杀头没籍之惨、死后遗作散逸的特殊人物而言，辑佚难度可想而知。倘若没有对金圣叹史实的长期沉潜和深入研究，是很难有所收获的。而这些佚作的文献价值亦不容忽视。如在《邵弥山水长卷跋》一文中，圣叹自称与晚明画家、长洲人邵弥“生既同里”，且画跋有“涅槃学人圣叹”落

款和“人瑞”、“圣叹”印章，这对确定圣叹籍贯及其字号的变迁情况提供了重要史料<sup>④</sup>。

其次，《全集》校勘，“以初刻本为底本”、文字校勘方面“明显的讹脱衍误，皆据后出版本校改”（前言第21页），严格遵循古籍整理的一般原则。《全集》共500多条校记，大都为扫清阅读障碍而出。但从这些看似简单的校记，不难看出整理者严格遵守有根据地订正的校勘原则，并精益求精，以对金圣叹著述版本刊刻流变过程的深入了解为前提，为每一处订正寻求更能体现作者原意的版本依据的严谨作风。如采用清坊刻王望如评本参校《第五才子书》，因为“在金氏在世时，有明确时间而且不是贯华堂刊刻的《第五才子书》，惟有醉耕堂顺治十四年刻本”（《年谱》第67页），则其文字、内容应该是与圣叹之意不相悖谬甚或是得到其承认的。书中据王本出有近50条校记，改正了一些批语中讹误。如第五十五回文中夹批，贯华堂本作“只三句，而句句恰怕”语，殊不可解；整理本据王本改作“合拍”（《全集》四，第1013页），文理得以贯通。在对校法之外，《全集》还采用他校法、本校法等，或翻检文献原始出处，或参考同时期其他史料，或文本前后对勘，以纠正讹误。如据《旧唐书》校出《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首题下小注“陈谦”为“陈谏”之误（《全集》一，第331页），如据《沉吟楼诗选》中其他二诗题目改正《住般公别院旬日有虚栗仲见访》诗题中“别”、“栗”二字（《全集》二，第1177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的校记已兼有注释的作用，如指出《第六才子书》批语中王斫山小传中“文孙”当为“玄孙”之误（《全集》二，第1005页），建立在对王瀚生平准确考证的基础上，又如《诗选》中就《冬夜读徐瀑悬诗》一诗对诗题、小序及诗句出有三条校记（《全集》二，第1209页），则是翻检徐增别集并参照叶绍袁《甲行日注》所得，是整理者由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需要，将视野放射到其生平交游的结果。这已非单纯严守校勘原则所能达到，而是整理者同时又是研究专家的身份，在古籍整理过程中特有的优势呈现。

再次，《全集》将圣叹全部著述以文体形式为标准，厘为“诗词曲”、“白话小说”、“散文杂著”三大类，以批评著作为主体进行编排，各类文体的自创之作则按体分别附入。这种编排方式，是整理者多方权衡，“考虑到圣叹著述的特色、古今

①陈洪《钱谦益与金圣叹“仙坛倡和”透视》，《南开学报》1993年第6期。

②《金圣叹批评心路》，《新华文摘》2009年第12期“论点摘编”。

③吴正岚《金圣叹评传》论陆林有关金圣叹研究成果的学术特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④陆林《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文体概念的融通、今人阅读的习惯和研究分类的需要,以及对文集类的全集编纂的基本理解”(前言第20页)之后的结果,其中整理者为方便研究,而以学理为依据对原本作出的大胆突破,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如由刘献廷编选的《沉吟楼诗选》,可能受到先有选集初稿、后又增益佚作的编排方式影响,问题非常明显,邓之诚先生就有“秩序颠倒,使出献廷之手,当不至是”<sup>①</sup>的疑惑。整理本因此在编排时“将相关逸诗置于前题所在位置”,予以集中,为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此外,整理本还有一些细节的处理,也很值得称道。如将《读第六才子书法》和《鱼庭闻贯》各条,依《读第五才子书法》例,加上序号,又如为《第六才子书》文中各折依目录加上折名,以方便研究者征引。虽是极细微之处,也可见出整理者自身作为研究者,在细读文本、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在甘苦自知的情况下,形成的“读者”关怀意识。

### 三、规范学术边界、彰显学术品位的附录

金圣叹一生著述丰厚繁杂、版本复杂且序跋众多,其人其文出人意表,几百年来一直是笔记小说最好的素材,这就为资料收集和选录带来了困难。全集整理者对此提出“只能择其基本文献予以选录”(前言第21页)之说。通观附录,不难发现,所谓“基本文献”标准,似易实难,是建立在对金圣叹文化身份的准确定位和对《全集》学术品位的自觉追求之上的,即整理者试图通过是选择了最能体现金圣叹作为杰出文学批评家身份,也是最能促进和深化金圣叹研究的资料。

《全集》附录分为《金圣叹年谱简编》、《金圣叹著作序跋》、《金圣叹传记资料》、《“哭庙案”史料》四类。《年谱简编》是作者十几年金圣叹史实研究的浓缩呈现,收集资料丰富,对金圣叹一生所涉人和事均给以准确考述,一时无考者亦加以说明,同时对涉及的人和事与传主之间的深层联系,也进行了要言不烦的阐释。如在“二十岁”、“二十八岁”、“二十九岁”下,对圣叹延续近十年的扶乩降神活动,特别是降乩叶绍袁家的过程作出细致考述,为我们了解这位批评大师早年活动和其思想动态,提供了翔实而完整的文献资料(《全集》附录第18—29页),其重要性已见上述。又如在“十五岁”下,不仅首次在金圣叹研究史上著录了金圣叹与晚明著名文学家王思任的交往,并作出

分析,指出王氏撰《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盛赞天下高才,历数古人有左丘明、宋玉、蒙庄、司马子长、陶渊明、老杜、大苏、罗贯中、王实甫等,“直接启示了圣叹‘六才子书’之说”,而王氏诙谐善谑、放言无忌的性格,也对圣叹为人处世产生影响(第17页)。作者从约20万字的《小题才子文》的若干解题中提取出的这则典型材料,凸显了圣叹由王氏“看花宜白衿,踏雪宜艳妆”一语雅艳浓淡映照济补的境界领悟古人笔墨秘诀之事,让我们由此了解圣叹文学批评中触类旁通、不滞不脱的思维方式,在其早年即以呈现的事实,足以见出《全集》整理者其学术敏感和理论思辨水平。

后三类资料收录也都体现了文献和理论价值兼具的特点。如金圣叹各种著述的序跋,为研究其人其作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其中仅见于初刻本的圣叹好友的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不仅详细地叙述了圣叹各种著述的先后顺序和完成刊刻情况,还以生动的笔墨描摹了圣叹变化万端、不可方物的风采(第146页)。又,其中共收录《第六才子书》序跋资料九篇,时间跨越有清一代,作者身份有文人、书商、戏曲作家等,写作角度有关于批评方法的争论,有对其主旨解读的批评,亦有以其文法批评作为“卖点”相号召的。通过这九篇序跋,读者几乎可以建构了一个清晰完备的金批《西厢》之再批评的简史。《传记资料》没有辑录后世笔记野史中光怪陆离的传闻逸事,仅收录廖燕、孟森、陈登原、蔡冠洛四人之作,资料分别出自文集、学术性著作和史传性著作,一方面避免了与已有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之类著作的雷同,另一方面也可见出整理者严守纯学术研究边界的意识。《“哭庙案”史料》除收录了学界引用较多、较为熟悉的《哭庙异闻》和《辛丑纪闻》外,增加了顾予咸《雅园居士自叙》,从而使这场“学生运动”中一直隐隐绰绰存在着的江南士绅身影,第一次明朗化了。尤其是顾予咸所叙与朱国治之间的嫌隙,可补充民间和局外人记录之不足,揭示了哭庙案背后的官场险恶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使我们对圣叹为之殒身的这场冤案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综上所述,新版《金圣叹全集》是继1985年版曹方人、周锡山二先生整理的《金圣叹全集》之后,在金圣叹研究又经历了二十年学术繁荣积累的前提下,能充分回应当前学术界深化研究需要的古籍整理力作。陆林先生以清明理智坚守学术边界,以严谨态度规范学术品格,为学界提供了一个体现“整理亦研究”理想的典型样本。(责任编辑:陈剑)

<sup>①</sup>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36页。